主编/张伟 责编/何文娟 校对/肖维波 美编/焦九菊
电话：(010)84078838-6136 本版邮箱：wenwubao@vip.sina.com
2023年4月18日

深挖革命文物内涵 传承弘扬红色基因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433”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创新实践

孔维征 王清秀 宋胜健

台儿庄区位于山东省最南部，是台儿庄战役的发生地，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也是八路军115师运河支队的根据地，留下了丰富厚重的革命文物资源。目前，全区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2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国有博物馆4家，馆藏革命文物5000多件（套）；非国有博物馆1家，馆藏革命文物867件（套）；建成红色村史馆6处。2020年7月，台儿庄区入选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2021年1月，台儿庄大战旧址等5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被列入山东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近年来，台儿庄区依托丰富的革命文物资源，以“保护革命文物、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探索出四个实、三个常、三个新的“433”路子，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利用取得明显成效。

聚力留住革命记忆，“四实”方针抓保护

坚持出实招、求实效，真正把革命文物管起来、保护好，切实留住红色根基。一是摸实红色家底。全面开展革命文物普查，通过聘请专家指导、查阅历史资料、走访革命前辈等方式，对台儿庄区范围内抗日战争时期以来的重要机构旧址、重要活动旧址、重要会议旧址，以及重要事件、重大战役战斗等革命文物进行调研排查，逐项建立台账，全面摸清全区革命文物资源底数和保存现状，分级分类纳入革命文物名录。二是做实依法保护。成立台儿庄中华文化促进会、台儿庄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等机构，不断加强革命文物价值的挖掘与研究，及时把革命文物依法纳入保护范畴，提升其保护级别，先后将清真古寺、新关帝庙、火车站等台儿庄大战旧址申报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古民居、大战无名烈士遗骸发掘遗址申报为山东省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提请山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山东省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条例》，为古城内革命文物保护增添了一道“护身符”。三是压实保护责任。强化属地管理原则，按照“四有”标准，对每一处革命文物落实具体管护措施，并设置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牌。聘请33名文物保护监督员，及时发现、纠正文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加强日常管理，对馆藏革命文物严格登记建档，实施预防性保护和修复，对珍贵革命文物聘请专家进行鉴别定级。四是夯实资金保障。通过争取专项资金、募集社会捐赠、财政资金投入等方式，加强对革命文物点的修缮保护，打出文物保护的“组合拳”。2016年以来，共争取国家、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5000多万元，其中用于革命文物的专项资金2000多万元，实施了台儿庄大战旧址消防、安防设施建设，完成了清真古寺、古民居等修缮保护工程，确保了文物安全。

聚力传承红色基因，“三常”用力抓弘扬

用好革命纪念馆、陈列馆，久久为功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一是常讲红色故事。在台儿庄古城建设6处抗战主题展馆，设置7处现场教学点，并配有红色教育培训专员，讲好红色故事，打造干部党性教育基地。先后接待各类培训班2000余场、培训学员1.6万人次，30多个高等院校在此设立现场教学基地。依托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等场馆，展出珍贵革命文物、影视、图片史料2000余件（套），用心讲好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队长仵德厚家训、抗战女兵刘守玟等“红色故事”。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等3家专题博物馆、纪念馆实行免费开放，年接待量达300万人次，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先后被批准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育示范基地、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二是常思革命先烈。结合清明节、抗战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国庆节、国家公祭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了“诵读抗战家书讲述抗战故事”“追忆峥嵘岁月聆听英雄故事”“烈士纪念日”公祭烈士等活动，弘扬革命精神，缅怀革命先烈。三是常学红色文化。开展了“台儿庄大战老兵重走抗战路”“向大战英烈献花活动”“台儿庄战役研究会年会”等活动，推动革命文物进军营、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农村。围绕庆祝建党百年，举办了“台儿庄大战中的中共党员”专题展览，通过英雄事迹的展现，彰显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深度挖掘大战文化，编纂出版了《运河支队抗战史》《台儿庄烽火》《台儿庄涅槃》《见证——中外记者亲历的台儿庄大战》等文史资料，向机关干部、中小学师生及广大群众等免费发放。

台儿庄大战旧址火车站

聚力发展红色产业，“三新”导向抓利用

抓住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大机遇，推进红色文化与红色旅游、艺术创作、乡村振兴等深度融合，把红色资源变成红色产业。一是业态创新。依托现有文化资源和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遗存，突出抗战精神，创新红色旅游产品，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产业，推出红色研学游精品线路，打造红色旅游品牌。以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为主体的台儿庄大战遗址被列入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台儿庄古城被评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二是模式创新。一方面注重把红色元素融入演艺中，推出鼓乐剧《台儿庄大捷》，通过运河大鼓的表演将游客带入到台儿庄大战意境中，让游客在感受战场的激烈、战争的残酷的同时，感受到国人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和众志成城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注重大战文化在文创产品中的活化传承，开发大战系列文创产品，实现“文创+红色旅游”模式。如1938大战酒、大战纪念邮册、纪念币、纪念版青铜徽章、《血战台儿庄》连环画等深受游客青睐。三是载体创新。谋划实施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馆藏文物数字化保护、台儿庄大战旧址火车站保护展示以及黑山西茅草房居落修缮保护、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创建、八路军115师运河支队黄丘山套抗战根据地红色旅游区等项目，建设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加强乡村革命旧址展示利用，做大做强红色文化旅游产业，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力。

发挥博物馆公共性 增进人民文化福祉

——以博物馆参与性收藏为基点

周晨星 毕经纬

“藏品是博物馆的心脏”，收藏是博物馆的基本职能之一。参与性收藏是基于“记录今天”“为未来保存当代记忆”的理念而新兴的收藏实践，其在博物馆发展目标的指导下，将藏品征集与收藏这项工作向公众开放，邀请公众通过参与相关活动与馆方一同建构藏品体系，强调公众的参与性，将公众与博物馆紧密相连。

参与性收藏的基本特点

关注当下——延伸时间维度。传统收藏强调藏品时间维度上的积淀感，博物馆特别是国有博物馆往往重点收藏古代文物。但随着社会发展，物品代际更新速度加快，延伸收藏的时间维度是为后代保留当代记忆的必要举措。参与性收藏将当下正在经历的重要事件、急速消失的生活方式、具有重大见证价值的物品和时刻都包含在收藏范围内，把现实的社会生活纳入博物馆资源的范畴加以利用，帮助我们在未来讲述现在的故事，促进历史、现在和未来的衔接统一。

去精英化——价值彰显日常。博物馆诞生伊始，无论是收藏、展示或传播都带有一定程度的自上而下的精英或权威色彩。但随着地方意识的觉醒，人们逐渐开始追溯与回顾地方历史，强调故乡的归属感。参与性收藏促使原有的泛地域收藏向在地式收藏转变，从追求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董”向承载地方历史变革、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平凡物品转变，博物馆化领域不断拓展，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收藏的精英色彩。而且在当今博物馆藏品征集实践中，出现了以社会文化本位为视角的征集思路，强调博物馆要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在参与性收藏中，赋权边缘群体，尊重他们的多元文化，展示他们的日常生活，避免因精英主义和馆方的文化强势而建构文化弱势者，以挑战刻板印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重视情感——完善藏品内涵。受工业革命、科学发展等因素影响，博物馆重视物的知识价值而对物背后的情感有所忽略。但博物馆物具有人格化特征，是承载情感印记的物证，其无一不在缅怀、回放和体现人类逝去的故事和记忆。参与性收藏侧重人与物的关联，强调人与物的结合。此时物充当镜子的角色——公众可以看到与自己相关的映像，并利用博物馆公共性的特征，通过物的情感与他人产生共情，从而缩小认知差异，产生文化认同。

参与性收藏构建方式及其现实意义

参与性收藏重点关注当下社会发展变革、重要事件和社会议题，因此适用范围有限，多呈现在社区博物馆、城市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和人类学博物馆中。笔者结合案例和相关理论总结参与性收藏构建方式和现实意义，如下。

提供平等的可及性的参与机会。参与性收藏采用自下而上的日常视角，启用博物馆的论坛面相，改变传统以馆方为主导的传播——接收方式，鼓励公众加入博物馆藏品利用体系中，与他人分享自身经历和故事，并针对多元议题进行讨论和对话。而吸引公众参与的重要前提是馆方需为所有公众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和多样的参与方式，即“让博物馆可以覆盖的所有人共同参与文化”。西安市城市记忆博物馆开展的“城市记忆1000+”计划降低公众参与门槛，减少年龄和知识水平的限制，为市民提供实物、文字、影像、口述等多种贡献方式的选择。社会图像收集项目利用网站邀请公众为馆方贡献日常生活中的数字图像，适应了网络时代的趋势。

重视个体记忆以塑造群体记忆。社会记忆是由个体记忆组成的，相较于宏大抽象的社会记忆来说，个体记忆是有温度的、鲜活的和具体的。参与性收藏邀请公众分享自己的个人化经历，使公众回到个人的生命经验和感受中，保留个体记忆的特殊性，并通过个体视角的阐述引发观众共鸣、个体记忆数量的叠加呈现整体的社区或城市记忆。“城市记忆1000+”计划以文字、影像、实物等形式，记录每个人的城市记忆。

发挥引导作用激发公众主动性。目前参与性收藏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多呈现馆方主导的形式，在主题策划或活动设计时，往往是由项目负责人担任协调者，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虽取得一定成果，但公众主动性有限，由公众自主发起的项目极少。馆方能做的是以更加包容开放的态度和多元便捷的方式打破自身与公众间的壁垒，逐渐由馆方主导向公众主动——馆方辅助的形式过渡，使公众获得更为自主的话语权。上海虹桥机场新村社区博物馆与居民共同经营和管理博物馆，增强居民的自主自治意识，提升居民的社区责任感，并向外部传播独特的社区文化。

参与性收藏的现实意义。参与性收藏让公众直接参与到博物馆收藏中，扩大了公众的参与范围；关注博物馆物的多元性，重视物背后的情感和记忆，并将现实生活融入博物馆的资源体系中，加深博物馆化的拓展程度，从而丰富藏品的内涵和外延，缓解众多博物馆藏品征集的困境。参与性收藏为多元群体提供参与诠释的对话空间和展示平台，不因社会价值的差异而区别对待，利于构建平等包容的公共空间。通过参与性收藏，馆方可重新审视原有的收藏和阐释体系，改善现有展览的组织和呈现方式，以更好地服务公众。

关于博物馆参与性收藏的思考

一是妥善有序的管理。参与性收藏不是“一次性”实践，妥善有序的管理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强心剂”，馆方需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项目形成前，馆方要明确参与性收藏理念与自身定位和使命是否契合，在适用的基础上审视现有收藏体系，分析自身及所在地区优势，随后设立清晰的收集目标、收集方式和合适的参与限制条件，避免收藏中的面面俱到和无意义的同质化。项目进行中，馆方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和更新收集策略，并为实物、文字、影像、记忆等建立规范的藏品档案。项目完成后，馆方需使公众知晓自己所贡献内容的利用形式和计划，以及其行为对于博物馆文化传播和藏品建设的意义。同时，馆方要做好项目评估以便后续的改进与再创。

二是充分利用数字手段。为了创建持续的有意义的社会数字资源收藏，馆方要对文化和社会的变迁保持敏感，应契合网络时代的生活方式，利用高效便捷的网络社区和数字手段进行收集，建立便捷易操作的收集平台，提高工作人员能力的同时，避免不愉快的用户体验和数字鸿沟对平等参与的制约。

三是恰当处理收藏伦理。在参与性收藏中，馆方需考虑与公众间的权力分配、自身程序规范性、内容来源合法性和所有权的问题，要将社会和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保持与公众间的信任联系、保证过程的公开透明、多元立场的共同呈现和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的培养，尽可能避免影响机构、学术和文化公信力事件的出现。

四是进行跨学科研究。参与性收藏中的“参与”一词本身就源于传播学视域，且博物馆物所承载的信息具有跨学科属性，对其全面完整的研究和保护需多学科知识的储备。博物馆开展参与性收藏实践时要充分运用不同学科的方法论，为公众搭建创作、交流和分享物的桥梁，帮助公众进行转换观察和思考，更好处理分歧和差异，并促进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共同呈现和对话。

参与性收藏是博物馆以公众和社区利益为出发点，切实践行以人为本理念的积极行动；是促进公众广泛参与以增进人民文化福祉和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但需要注意的是，参与性收藏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博物馆，在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前，馆方要把握好适用范围和条件。同时，要尝试将公众参与贯彻到前期的收藏、后期的研究、展示和宣教中，从而实现参与的最大化，促进博物馆公共性的充分发挥。

暹罗国“金叶表文”的历史、性质及作用

李珣泽

清暹罗国金叶表文、金表筒　清缅甸国金叶表文、象牙表筒

“金叶表文”是明清时期暹罗遣使“朝贡”的合法明证。最早见诸史籍的“金叶表文”为隋时赤土国进奉的金叶国书，唐、宋、元时期，东南亚诸国遣使赍送金叶表亦多见诸史籍，仅称谓不同。明清两代，暹罗国遣使朝贡均使用“金叶表文”。“金叶表文”作为清代暹罗国正式赍送的国书表章，见证了清代中泰关系的发展与演变，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历史上的“金叶表文”

隋唐时期的金叶国书　最早见诸史籍的“金叶表文”为隋时赤土国进奉的金叶国书，史载：“寻遣那邪迦随骏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多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令婆罗门以香花奏鼗鼓而送之。”多罗叶，即贝多罗树的叶子，经过制作修整可制成用于书写文字的贝叶，使用贝叶书写宗教典籍最早起源于古印度，此处“多罗叶”即指贝叶。“铸金”，此贝叶表章为黄金所制，体现了其对国书表章的重视。“隐起成文以为表”，显示了其表章的制作方法，我国信奉南传佛教的傣族地区贝叶经书写是用硬笔在贝叶表面刻画文字，金属做的笔尖没有墨料，在贝叶上留下较深的划痕，为我们理解“隐起成文以为表”提供了线索。唐代投和赍送的表章史籍记载为，“遣使以黄金函内表”，其形式与年代相隔不远的隋时赤土国表章相同，同为金函盛装。目前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暹罗国“金叶表文”与隋代表文相似，其文字亦是用硬笔在金叶上进行刻画，留下若隐若现的文字。

宋元时期的金字表　宋元时期，东南亚诸国遣使赍送“金叶表文”亦多见诸史籍，仅是称谓不同。宋代真里富赍送的表章，史籍记载为“其表系金打卷子”，推测其材质为黄金，卷起来为圆柱体小卷，打开后为长方形金制薄片（金叶）。故宫现存的清代暹罗国金叶表在未展开前，也是卷起来保存的，形似一个金制小卷子。宋代蒲端国，其表章史籍记载为“金版镌表”，也是将文字刻画在金制薄片（金叶）上的表章，其形制与隋时表章一脉相承，与现存的清代暹罗国表章形制相似。元代，东南亚诸国进奉的国书有了较为固定的称谓“金字表”，偶尔称为“金叶书”。其称谓已与明清两代“金叶表”相近。此时期向中国进奉金叶表的国家有缅国、暹国、爪哇等。关于元代金叶表章记载，《元史》在“释老”条目记载“必兰纳识里”时提到：“是时诸番朝贡，表笺文字无能识者，皆令必兰纳识里译进。尝有以金刻字为表进者，帝遣视之，廷中愕眙，观所以对。必兰纳识里随取案上墨汁涂金叶，审其字，命左右执笔，口授表中语及使人名氏，与贡物之数，书而上之。明日，有司阅其物色，与所赍重译之书无少差者。众无不服其博识，而竟莫测其何所从授，或者以为神悟云。”不仅记载了此时期藩国表章为金刻字，还提到了必兰纳识里在翻译过程中处理金叶表章的具体操作，这些具体记载显示其与前朝金叶表章一脉相承，与故宫所存清代暹罗国“金叶表文”相似。

明清时期的“金叶表文”　明清两代，暹罗国遣使朝贡均使用“金叶表文”，缅甸朝贡除使用“金叶表文”外，也使用“银叶表文”，而南掌国朝贡“表文”多为“蒲叶表文”。关于清代暹罗国“金叶表文”的形制，《嘉庆朝会典》记载：“表用金叶，贮以金筒锦袱锦袋，袋上有金钮金圈，加盛以螺钿盒一、贴金盒一，并有花缎盒套，套上各有金圈。”所见实物与史籍记载相符。故宫博物院藏嘉庆朝“金叶表文”，在其正文中提到“奏呈金叶表，并请贡吉祥方物及汉字堪合”。金叶表文在东南亚一些朝贡国中有着很深的物质文化渊源，在古代东南亚诸国与中国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其形制至晚在隋时已确定，历经唐、宋、元几乎没有大的改变，至明清时期成为暹罗遣使朝贡的重要文件之一。

暹罗国“金叶表文”的作用与性质

关于朝贡“表文”，明代规定“四夷入中国，必奉表文”，清廷规定“凡外国朝贡，以表文方物为凭，该督抚查照的实，方准具题入贡”。在这里朝贡“表文”与“勘合”等物又一起成为诸国遣使朝贡的凭证。曼谷王朝前期（乾隆四十七年至咸丰三年）暹罗频繁遣使来华并赍送方物，不但有例贡，还有其他名目的遣使理由，如：遣使请封、遣使谢恩、庆贺登基、庆贺万寿、遣使进香等，这一阶段清暹关系进入稳定期。在此阶段“例贡”“请封贡”“谢恩贡”“万寿贡”“庆贺贡”“进香贡”是其主要属性，亦反映了其表文的性质与属性。

故宫博物院现存暹罗国金叶表文15件（套），笔者参与识读翻译其中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5件（套），内容涉及例贡、谢恩和进香事宜。其中，例贡表文嘉道咸三朝各1件（套），谢恩贡表文道光朝1件（套），进香贡表文咸丰朝1件（套）。各表文详细信息如下：

例贡表文

咸丰二年（1852年）例贡表文（故00011710）黄金制成，长方形薄片，形似书页，金叶表面划刻有暹罗文字五行。表文内容翻译如下：

“新登基的尊贵的大城圣阿瑜陀耶（暹罗国）之圣主，心中切念咸丰大皇帝陛下长久以来之王谊，特差贡使帕萨瓦迪顺通阿派、副贡使銮波纹萨内哈、三使銮坡加纳皮蒙、办事昆皮丕塔瓦加和大通事昆坡加纳披集，奏呈金叶表，并请朝贡方物及汉字堪合，前来进贡咸丰大皇帝陛下，此系承袭自往昔始伟大帝王之王家旧俗惯例。”

以上内容可看出，例贡表文行文较为统一。主要内容包括：暹罗国王、清朝皇帝的尊称，贡使的爵衔、职位、名称（或是尊名），以及遣使朝贡目的“心中切念嘉庆大皇帝陛下长久以来之王谊……进贡道光大皇帝陛下”。表文主要作用是：暹罗国王表达对清朝皇帝的“王谊”，加深清暹间友好关系。

谢恩贡表文

道光七年（1827年）谢恩敕封表文（故00011714）黄金制成，长方形薄片，形似书页，金叶表面划刻有暹罗文字五行。附有金表筒1件。表文内容翻译如下：

“尊贵的大城圣阿瑜陀耶（暹罗国）之圣主，敦睦王谊，感戴大清国道光皇帝陛下，照旧例赐封暹罗国主为统治暹罗国之国王，特向道光大皇帝陛下致谢，心中喜悦，特差贡使帕萨瓦迪顺通阿派、副贡使銮波纹萨内哈、通事昆坡加纳披集，奏呈金叶表及堪合，并请朝贡方物，前来拜谢道光大皇帝陛下之赐封，此系承袭自往昔始伟大帝王之王家旧俗惯例。”

这件谢恩表文，除例贡表文内容外，增加了“拜谢”的内容。此件表文主要作用是：暹罗国王拉玛三世（中文名“郑福”）拜谢道光皇帝对其敕封。

进香贡表文

咸丰元年（1851年）进香表文（故00011713）黄金制成，长方形薄片，形似书页，金叶表面划刻有暹罗文字七行。表文内容翻译如下：

“……大城圣阿瑜陀耶（暹罗国）国主新登基，为敦睦王谊，向咸丰新皇帝陛下，有表文……相互，道光皇帝陛下摆驾花园宸游，患病加上……尾数一年、鸡年、二月，自花园返回至大王宫……皇太后非常……病情加剧，驾崩，于上弦半月初十四……向道光皇帝陛下致以深切哀悼，便致金叶表，奏呈金叶表……大通事昆××一位，请上堪合，前来拜谒道光皇帝陛下遗体……自往昔始。”

这件进香表文，由于表文年代久远，金质表文折痕处暹字难以分辨，故难以完整释读。已释读表文内容与例贡、谢恩表文表述有较大区别，此件进香表文描述较为详细，加深了暹罗国王与新登基咸丰皇帝的友谊。

暹罗自元代便与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双边关系，明代暹罗多次遣使来华，清代双边关系进一步加深，元、明、清三代中暹之间均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其间暹罗均以“金叶表文”作为遣使来华巩固友好关系的纽带，可以说暹罗国“金叶表文”是中国和泰国双边历史悠久的友好关系的见证。对于暹罗国“金叶表文”深入细致研究，可为现今中泰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提供重要智力支撑。